

OXFORD



# 香港人之香港史

蔡榮芳

8 4 1 - 1 9 4 5



# 香港人之香港史

*The Hong Kong People's History*  
1841—1945  
*of Hong Kong*

蔡榮芳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Taipei Tokyo Toronto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First published 2001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5 7 9 10 8 6 4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香港人之香港史 1841–1945

*The Hong Kong People's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1–1945*

蔡榮芳 (Jung-fang Tsai)

ISBN 978-0-19-592778-8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扉頁地圖選自《袖珍香港九龍地圖》(香港：中華書局，1940年)：

1. 香港九龍兼新界形勢圖 1940年
2. 香港市區街道圖 1940年
3. 九龍半島街道圖 1940年

---

# 目 錄

---

緒言	1
香港華人身份認同與歷史研究之「用處」	1
「殖民史學」、「愛國史學」與「香港本位之史學」	5
本書之主題	9
致謝	12
一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華人社會 1841 - 1884 年	15
歷史淵源：廣東的經濟、社會情況	15
鴉片戰爭期間之「漢奸」與「義民」	16
1840 年代的香港：邊緣開墾地	19
1850 年代：歷史的轉捩點；華人社會的成長	27
1856-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對香港華人之衝擊	31
英國殖民統治下，華商社會經濟實力之成長與壯大	36
1860-80 年代，紳商文化霸權之下的華人社會	39
香港華商之紳士化：以高滿華家族為例	44
處於中英兩國之間，華人、華商的困境	48
華商與殖民政府的矛盾關係：合作與抱怨	50
基層民眾與殖民政府之關係	51
二 社會變遷與民族主義運動 1885 - 1900 年代	55
1885 年至 1900 年代之社會變遷	55
1890 年代以後，殖民政府、紳商與民眾之三角關係	59
多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國民主義)	60
何啟與胡禮垣的維新論：依附外國強權之自由式民族主義	61
香港華商的特性：「與英帝協力的民族主義」	63
英國佔據新界(1899 年)	66
香港：中國革命的基地	69
1905-06 年反美杯葛運動	71
1908 年反日杯葛運動	76
三 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時期香港之社會運動 1909 - 1922 年	83
革命志士、勞工與四邑商工總會	83

辛亥革命對香港之衝擊，1911-1912年	87
企圖刺殺梅軒利總督	89
1912-1913年杯葛電車運動	91
各邑會館，如雨後春筍	93
廣東國民政府自毀形象，遭省港民眾背棄	97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之香港，1914-1918年	100
五四運動與香港，1919年	102
1920年機器工人罷工	107
海員的工作、生涯與組織	109
1922年海員大罷工	111
<b>四 省港大罷工(1925-1926)及其後之社會文化：新解釋與評估</b>	<b>121</b>
五卅慘案後，國共左翼人士，緊密籌備罷工罷課	123
各校學生罷課	125
香港工團委員會宣言與要求	127
各業工人罷工，民眾匆匆離港	128
罷工九大因素：僅僅愛國主義，不足以解釋錯綜複雜的大罷工	129
罷工諸多重要因素：緊密運動、威脅、利誘、謠言、恐慌、混亂	131
沙基慘案及其後罷工之劇展	134
港人與港府協力，恢復秩序與生意：自衛團與工、商維持運動	138
「救國功夫，頭頭是道，不必同出一轍，方算愛國」	142
左翼廣東國民革命政府與港府之對抗	147
廣東商人對罷工之態度	149
國民黨左、右派的矛盾	151
華商代表團、懇親團晉省聯絡感情，企圖協商	153
廣州政治緊張	158
罷工之結束	159
省港大罷工的重要涵意	161
港府配合粵府勸共，港人懼共：「生人毋近」	162
罷工後港府保守的社會文化政策	164
魯迅與蕭伯納之香港經驗	167
<b>五 抗日戰爭期間(1931-41年)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b>	<b>173</b>
1931年香港華人抗議日本侵略滿州：杯葛日貨，毆打、刺殺日僑	174
1932年港人對上海事件之反應	182
1930年代大陸企業遷港及華資之發展	183
內地新文化的影響：香港新文學之誕生	187

1937年「七七事變」後，香港社會緊張情緒	189
香港之抗日文化活動	190
惠陽旅港青年之抗日活動	197
工人工會與抗日運動	199
旅港各邑商會、同鄉會之抗日運動	201
香港的另一面：「頹廢的」資本主義消費者社會	203
宛如萬花筒的香港社會	207
政治派系雜處的香港	214
新聞出版界，左右黨派之爭	216
汪精衛派系也自稱愛國	218
國民黨特務與黑道人物，皆自稱愛國	222
再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之複雜性與多面性	225
<b>六 日軍佔領地(1941-45年)太陽旗飄揚，太陽旗倒了</b>	<b>229</b>
新界、九龍迅速陷落：民眾唾棄英人統治者	230
港島淪陷：人心惶惶，文化人猶圖團結抗日	234
港島街市一場浩劫：日軍、爛仔與文化人	238
抗日游擊隊與文化人的脫逃	242
港人對日人統治之反應：抗拒、流亡、接受與合作	244
新秩序之建立：統治者拉攏華人紳商精英	248
三種協力者：消極被動、積極主動與真心誠意的協力者	252
華民參與地方行政管理：期望與慶祝盛會	261
日據後期：港人期望幻滅	265
太陽旗倒了：「日軍佔領地」終了	268
<b>七 結語</b>	<b>275</b>
<b>「愛國史學」迷思及「民族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b>	
「愛國史學」迷思	276
身份與國家認同之五點基本觀念	278
回顧港人多層次身份認同之歷史演變	278
港人運用各種身份，推進主張、維護權益	281
「與外國強權協力的民族主義」	284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曖昧複雜性與危險性	286
主要參考資料	297
索引	313

---

# 緒言

---

世界文化，一半為半受教育者摧殘，一半為飽受教育者摧殘。——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在香港大學演講，1933年2月13日

史學家所要掌握的，正是〔世事的〕變化。——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一群港人的大陸子女，上星期在〔香港〕政府總部門口示威……與警方有激烈的對峙和衝突……，高喊「生做香港人，死做香港鬼」，堅決不回大陸去了。

——《世界日報》1999年12月15日

## 香港華人身份認同與歷史研究之「用處」

近年來，香港華人的國家認同與自我定位，一直是關心香港的人們之一個議論焦點。到底香港華人如何界定自己與香港及中國之關係？根據近年來多次的調查報告，「香港人」與「中國人」是香港華人的兩個主要身份認同。<sup>1</sup> 他們雖然都是香港華人，但兩者有明顯的不同：個人的社會經濟背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對「六四事件」的體會、對香港民主政制改革的立場，皆有不同。可是，兩者都同樣抱持傳統的中國價值觀，以及認同一個建基於民族與歷史意義的中國。並且，兩者都對中國政府懷有負面的感情。<sup>2</sup>

---

1 在1985年的一項調查當中，60%的人自認為是香港人，36%自稱為中國人。1988年的比例是63.6%香港人，28.8%中國人。見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劉兆佳、關信基，*The Ethos of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 Lau Siu-Kai 劉兆佳，Lee Ming-Kwan 李明堃，Wong Po-san 尹寶珊 and Wong Siu-lun 黃紹倫，*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s: Hong Kong 1988*,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pp.177-178.

2 Lau Siu-kai, *Hongkongese or Chinese: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on the Eve of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Hong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事實上，一百多年來，港人在政治上認同中國為祖國，卻往往對中國政府抱着負面的態度。政治意識的形成，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歷史背景，由歷史演變而成。因此，以「香港為本位」的史觀來研究香港歷史，有助於吾人瞭解港人的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演變過程，也有助於吾人瞭解港人為什麼對中國政府時常懷有負面感情。以「香港為本位」的歷史知識，也可以幫助中國領導階層認清事實，對香港採取符合港人意願的政策，任由港人自己去創造自由、民主與法治的政治制度，任由港人充分發展他們的才智。惟有如此才能贏得港人正面的感情。否則，他們就以負面的態度，視中國政府為外來的強權，本質上類似過去英國殖民政權。

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各界、甚至學術界，都一致強調：「香港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神聖的領土」，港人認同中國，熱愛祖國。我認為「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的研究，確實是一個重要課題，不論「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在今日世界各地的顯現是福、或是禍。它也是本書的主題之一。我發現港人熱愛祖國，卻經常希望與祖國的政權保持一段距離。我在本書的許多章節，會詳細討論「愛國主義」(national patriotism)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實質與表現非常複雜：它有各種不同的形式與表現；它含有實質也有迷思(realities and myths)。而且，人們對國家認同的政治意識，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着歷史環境的變遷而改變。著名的法國史學家 Marc Bloch(1886-1944)曾經說：歷史是研究社會變遷的科學；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要知道世事如何變化；「史學家所要掌握的，正是〔世事的〕變化。」("It is change which the historian is seeking to grasp.")<sup>3</sup> 香港雖然「自古以來是中國神聖的領土」，但歷史並不是靜止不變，港人的身份認同與政治意識也隨着政治社會環境之變遷而改變。關於這點，下面稍做申論。

---

3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3, p. 46。與 Daniel Chirot,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 of Marc Bloch," in Theda Skocpol, ed.,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3.

1842-1949的大約百年間，由於香港與廣東之地緣與社會經濟之密切關係，中國對香港社會有巨大的影響。每逢大陸發生天災或經濟政治危機，都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等到大陸情況稍為舒暢，才還回家鄉。大部份的流動人口，視香港為暫時的避難地。然而，也有許多難民選擇留居香港，以港為家。選擇即是認同，某種程度的認同，有的人多，有的人少。香港人口逐年增加，認同香港的人年年增長。

身份認同有層次之分別：有主要與次要的層次。一般來說，華人重視祖籍，所以祖籍往往是他的主要認同對象。比如，一個來香港經商二、三十年的潮州人高滿華(1822-82年)，可能永遠認為自己是潮州人。但是，他也自稱為「旅港的潮州人」，有別於留居家鄉的潮州人；他熱心香港之社會公益，協助創立東華醫院與保良局，來造福香港華人社會；顯然地，他也認同香港。<sup>4</sup>

關於身份認同，有幾個基本的觀念，必需考慮，才能把歷史事實解釋清楚：第一，身份認同是多層次的，每個人可以同時有氏族、家鄉、地域、國家、階級等等的認同觀念。第二，認同一個國家，並不一定認同它的政權。一個人可能熱愛他的國家，可是痛恨它的腐敗政府。比如說，孫文熱愛中國，但痛恨中國的滿清政府。鄧小平熱愛中國，但憎惡蔣介石的腐敗專制政權。十九世紀中葉後一百多年來，移入香港的許多居民既認同中國，也認同香港；可是他們對中國的政權往往抱着負面的態度，所以選擇移民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兩害相權取其輕。

1950年，香港與中國雙方將邊界封鎖之後，兩地之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開始朝着資本與共產主義兩個相反的方向發展。香港人口當中，在港出生的人數，1971年已超過50%，1981年為57%，1991

---

4 甚至於，許多潮州人的後代在香港出生成長，也自稱原籍是潮州。大概他們主要認同香港，次要認同潮州。根據1981年的人口普查，香港總人口當中，57%出生於香港，但只有2.4%的人說原籍(the place of origin)是香港。見 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in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 in Ronald Skeldon, ed., *Reluctant Exile?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p. 22. 假如這樣就斷言只有2.4%的港人認同香港，那麼顯然是錯誤的。

年是60%，逐年上升。出生成長於香港的新世代，對香港產生熱烈的認同感，而對中國則相對地疏遠陌生。人類學家 Hugh Baker 於 1983 年的一篇論文裏指出，70 年代與 80 年代的「香港人」既不像中國人，也不像英國人；他具有獨特性：頭腦靈活、容易適合新環境、富有隨機應變的機智、倔強的競存能力、老練的物資享受嗜好、經常渴望興奮與刺激。<sup>5</sup>

1970 年代在香港受教育成長的新世代，政治意識高漲，投入各種社會政治運動。他們成為 1980 年代與 1990 年代香港民主運動的先驅者，為爭取香港人民的權益而奮鬥。<sup>6</sup>

最近，有些港人對中國的負面態度，也傳遞給大陸內地出生的子女。1999 年 12 月 15 日的《世界日報》報導來港的大陸港人子女，爭取香港居留權的抗爭：

一群港人的大陸子女，上星期在〔香港〕政府總部門口示威，……與警方有激烈的對峙和衝突……，高喊「生做香港人，死做香港鬼」，堅決不回大陸去了。<sup>7</sup>

「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是人民自發性的意識表現，而不是任何政權所能強加於人民的身上。如何才能獲得人民的認同，是執政者應該時時刻刻介意的。執政者可以從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期與日本佔領時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演變當中，學到正面與負面的教訓，獲得一些智慧。而被支配的一般民眾，也可以從歷史當中學到一

---

5 Hugh D.R. Baker,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95(September 1983), pp. 469-479; 與 "Social Chang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an in Search of Majori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6 (December 1993), pp. 864-877.

6 參考蘇耀昌 Alvin Y. So,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與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著，《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廣角鏡出版社，1983 年。

7 《世界日報》1999 年 12 月 15 日，C8 頁。據 1991 年的一項估計，95,000 名港人有配偶住在大陸內地；150,000 名港人有子女住在大陸；總共大陸有 310,000 名在大陸出生的港人子女。見 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in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 p. 23.

點機智：可以看清楚支配者一方面用權力威力、另一方面用虛構的政治迷思與神話(myths)來維持其統治。(比如：港英政府標榜「公平的法律」與「公正的司法」，同時它也獎勵「中國傳統文化」、儒家社會秩序與奉公守法的「美德」；而日本統治者高唱「王道之治」與「大東亞共榮圈」；目前特區政府則訴諸「愛國主義」與「民族感情」。)香港歷史的研究，對今日香港與中國頗有「用處」。

香港歷史研究，對今日的台灣也有「用處」，因為香港是台灣的「借鏡」。中國一再強調「台灣自古以來一直是中國神聖的領土。」可是，處於中國龐大陰影之下，多數的台灣人比香港人更強烈的希望與中國劃清界線、保持安全的距離。如何以理性來面對這個事實，目前對中國與台灣政府是一大考驗。歷史知識可望增進政治智慧。

本來，學術研究旨在探求真諦與追求知識，研究學問有其自足的領域，而不必斤斤計較它是否「有實際用處」。然而，華人(亦即中國人、香港人、台灣人，以及海外華僑)往往急功近利，談到知識就即刻追問它的「實際用處」。不知學術知識之價值是久遠的，它是批判性思考與理論之基石。沒有這塊基石就沒有前瞻性的智慧。學術知識的含義與「用處」隨着時間與環境之變化而改變。所以沒有學術知識之基石，就沒有前瞻性的智慧，就要等到面臨新問題之後，才要去尋找對目前有「用處」的知識，其結果是永遠學些皮毛，永遠落後一大步。華人重視「實用」與技藝，而相對地忽視探求真諦的學術研究，忽視抽象理論與基礎科學。近代中國科學之落後，其來有自。

## 「殖民主學」、「愛國史學」與「香港本位之史學」

香港的歷史，有各種不同的解釋與觀點。一直到最近，大多數的英文著作皆以西歐為中心來觀察與解釋香港的歷史。作者多數是英籍人士，包括 E.J. Eitel, James Norton-Kyshe, G.R. Sayer, G.B. Endacott, Nigel Cameron, Frank Welsh, Jan Morris 等等。<sup>8</sup> 這些著作不僅採取以

---

8 有關香港通史的主要英文著作有：E.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1895年初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年再版)。James

歐洲為中心(Eurocentric)的史觀，而且以殖民者精英的(elitist)立場來寫歷史，試圖合理化外來的殖民統治，因此可稱為「殖民者的歷史」或「殖民主義的史學」(colonial historical scholarship)。這些著作裏面，少數的英國統治者是歷史主要的演員，扮演着中心的角色，行使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而為數眾多的華人，要不是被忽略，就是站在旁邊被統治者任意指使。Jan Morris 所著通俗流行的《香港：一個帝國的收場語》(1997年修改版)這麼說：「香港華人是歷史的消極旁觀者。……甚少華人的名字出現在歷史書籍，因為甚少華人在香港的發展中扮演公共的角色。」<sup>9</sup>這可說是「殖民者的香港史」。

如今，香港雖處於「後殖民時代」(postcolonial age)，上列英國殖民史學著作，仍然是一般讀者的熱門讀物，依然充塞市上書店。這是今日香港的一個矛盾現象。香港尚未真正踏入「後殖民社會」之階段。

至於香港通史的中文學術著作，為數甚少，主要是中國史學家的作品，比如：丁又，《香港初期史話 1841-1907》(北京 1958 年)；元邦建，《香港史略》(香港 1988 年)；劉蜀永，《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 1998 年)；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 1994 年)；余繩武、劉蜀永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 1995 年)；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州 1996 年)，與《粵港關係史 1840-1984》(香港 1997)；以及齊鵬飛，《日出日落：香港問題一百五十六年(1841-1997)》(北京 1997 年)。<sup>10</sup>

---

Norton-Kys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kong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1898* (1898, 2nd edition 1971). G.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1937,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1980). G.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 (193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G.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nd edition, 1974).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3) 其他還有通俗的讀物，如 Nigel Cameron 的 *Hong Kong: The Cultured Pearl*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與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以及 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evised and updated, 1997.

9 Jan Morris, *Hong Kong: Epilogue to An Empire*, pp. 194-195.

10 其他比較有用的通俗書籍，有金應熙，《香港史話》，廣州 1988 年；劉蜀永，《香港歷史雜談》，石家莊市 1987 年；劉澤生，《香港古今》，廣州 1988 年；劉澤生，《香江夜談》，香港 1990 年；劉小清、劉曉滇編，《香港野史》，北京 1997 年；林慶元、

中國大陸史學家的上列著作，有幾個特徵：第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史觀為基點，斥責帝國主義對中國之侵略與殖民主義對華人之剝削。第二，以頗大的篇幅報導帝國主義如何發動戰爭，來奪取香港、九龍、新界等地。第三，也以頗大的篇幅討論中英外交協商與關係。第四，強調華人對香港經濟發展之貢獻。第五，強調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港人熱愛祖國，經常進行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英勇鬥爭。第六，堅稱香港人民與中國內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有反對資本帝國主義之共同任務。第七，以中國為本位，以中國人的立場，來研究香港的歷史。認為香港只是附屬於中國的一部份，無個別的特徵與權益。港人的反帝運動，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份。假如香港與中國之間，有利害衝突，則以中國為優先考慮。這是典型的「愛國主義的史學」(patriotic historical scholarship)。

中國的「愛國史學」與英國的「殖民史學」，在意識形態方面，形成強烈的對比。但矛盾的是，中國史家在許多地方，時常引用英國殖民史學的著作，依賴其資料與研究成果。因而兩者之間，就有重要的共通相似之處。第一，兩者都不以香港為本位，來研究香港的歷史。第二，兩者都不以「地方」人民的權益為首要考慮來解釋歷史。兩者都偏執「國家」的權力，不能容忍「以地方為首要」之「異說」。兩者都執迷「國權」，以「國權」壓制地方權益。兩者都蒙蔽了「地方」人民各自爭取權益之歷史事實。第三，兩者都忽略了對複雜的香港華人社會作深入的研究。<sup>11</sup> 第四，兩者都未能深入分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複雜微妙的關係。

這類的分析，是以「香港為本位」的學者之興趣所在。自從1960年代以來，Carl Smith 與 Henry J. Lethbridge 就開始發表一系列的研究論文，對香港之政治與社會作精緻的微觀與分析。在他們的論述

---

李景端主編，《百年風雨話香港》，南京1997年；霜崖，《香江舊事》，香港1974年；林友蘭，《香港史話》，香港1975年；與黎晉偉編，《香港百年史》，香港1948年。

11 《十九世紀的香港》第八章討論香港的社會結構，是堅實的一章，是好的開始。

裏，華人不再是歷史上消極被動的族羣，而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他們的論述，當然也多方談論到中國大陸，但他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香港從屬於中國，而只是因為大陸與香港保持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之關係。他們的研究興趣與焦點，在香港本土的歷史人文地理，而不在大陸。這就是我所謂「香港本位之史學」。<sup>12</sup>他們開創這個研究方向之後，其他學者紛紛跟進，陸續發表研究報告。<sup>13</sup>

雖然，香港本位的史學家之間，對香港的歷史人文地理，也各自有其不同的解釋與看法。因為，到底歷史是一種「敘述故事」(narrative)，以有證據的客觀事實為基礎，加上敘述者的主觀看法合併而成。每一個敘述者都有自己的立場與看法，從不同的角度來看歷史，因此就有許多不同見解的歷史論述。而且，每一個史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今日的經驗、思想與價值觀念，來思考與敘述過去發生的事。誠如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所說，歷史是吾人對於過去的活的思維，亦即是當代的思維(History is the living thought of the past)；「歷史是活的年鑒」("History is living chronicle.")；無論歷史家所寫的是古代、或近代的事，「每一部真實的歷史，都是當代歷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sup>14</sup>

---

12 見 Henry J. Lethbridge, *Hong K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arl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 比如：James Hayes,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Ct., 1977; *The Rural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Oxford, 1986. Elizabeth Sinn 洗玉儀,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Oxford, 1989. K. C. Fok, *Lectures on Hong Kong History: Hong Kong's Rol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1990. Wai Kwan Ch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Oxford, 1991. Ming K. Chan, ed.,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M.E. Sharpe, 1994. Jung-fang Tsai, *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等等。而近年來的中文學術著作，則有霍啟昌，《香港與近代中國》，香港：商務書局，1992年；王慶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下冊，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1997年。日文著作，有人類學家可兒弘明，《近代中國の苦力と「猪花」》，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

我相信每一個嚴謹的作者，都必需謹慎地考慮他(她)所用的文字，推敲每一個字句，試圖以最適當的文字真實地描述客觀的事實，並誠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與看法。本書時時使用批判性的文字，使用沒有修飾、沒有掩蓋的語言，來形容事實，目的在追求客觀與真實。譬如說：我用「獨裁統治」(dictatorship)一詞來形容名符其實的獨裁統治；而不用「強人政治」或「硬性權威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之類的術語(jargon)來掩飾獨裁。正好像用「汽車司機」一詞來稱呼汽車司機，而不用「汽車駕駛工程師」一詞來美化他；這樣比較接近客觀與真實。

從1971年，我就對香港歷史開始感到興趣。三十年的學習過程中，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受到多位朋友與同事的鼓勵與指導，自己也做過許多思考。這本書是長期間的學習心得報告，希望提供喜愛香港的讀者，作為參考資料。我發現自己對香港與中國歷史的思考與解釋，在許多地方與其他作者不同，盼望讀者參考指正。

## 本書之主題

香港的地理位置決定性地影響它的歷史演變。它跟中國大陸緊緊相連，因此無論是社會、經濟、文化與人口的結構，都跟廣東與中國大陸互相關聯。甚至在政治方面，雖然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六年，港人很大程度上，經常感受到來自廣東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勢力之衝擊與壓力。每次大陸發生什麼變動，即刻波及香港。因此，嚴謹地說，吾人不能單獨孤立的研究香港歷史，而必須兼顧中國大陸。然而，本書秉持「香港為本位」之史觀，以香港人之權益為首要考慮，來解釋

---

14 Benedetto Croce說：“History is living chronicle; ...history is principally an act of thought.”見克羅齊之名著 *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0, pp.12, 19 和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pp.17-19: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which underlie every historical judgment give to all history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because, however remote in time events there recounted may seem to be, the history in reality refers to present needs and present situations where in those events vibrate.”



香港的歷史，因此命名《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年》，目的在探討：從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大約百年之間，在來自中國之政治、社會勢力的衝擊之下，香港的歷史演變與主要社會、政治運動。

本書共分七章。第一章首先討論鴉片戰爭期間之「漢奸」與「義民」，大多缺乏國家民族意識。進而探討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華人社會之形成與演變；以及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1860年代以後，華人紳商如何在華人社會建立「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處於中、英兩國之間，港人有何困境？港人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殖民政府、華商與民眾之三角關係若何？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殖民地緊張的社會關係導致動亂，有何含義？

第二章討論1885年至1900年代，香港的社會變遷。華人社會漸趨多元複雜，老一輩紳商的「文化霸權」開始面臨挑戰。與此同時，香港也感受到晚清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之衝擊，有些華人知識份子投入中國的維新與革命運動。可是，他們的維新思想與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有何不同？有什麼特色？如何反映香港的社會？革命黨人以香港為基地，他們的民族主義如何受到香港環境之影響？一般華商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認識，如何反映香港的商業環境？總之，香港華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有什麼特性？到底個人利益與民族主義之關係如何？這種關係如何反映在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和1908年的反日杯葛運動？港商如何運用民族主義運動，來爭取自己的商業利益？

第三章則敘述1909年至1922年期間，香港之各種社會運動。辛亥革命對香港造成什麼衝擊？一般民眾之政治化如何表現？為什麼有人要刺殺香港總督？當時為什麼各邑會館紛紛成立？港人認同中國民族主義之同時，為什麼還要跟中國保持距離？五四運動對香港有什麼影響？走在「近代化」前端的大英帝國，在香港獎勵中國「傳統文化」，其故安在？香港似乎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港人對國家與地方認同的矛盾，新舊文化的矛盾，以及勞資紛爭的矛盾。五四運動之政治衝擊，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經濟環境，兩個因素之結合，推